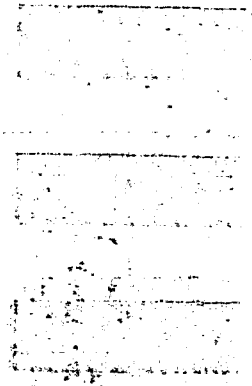


# 中共六將星



德	朱
懷	彭
彪	林
毅	陳
承	劉
龍	賀

版 出 社 文 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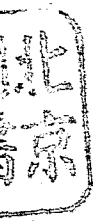


中  
共  
大  
學  
學  
報



3 1797 7563 4

## 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



朱德是一位天才戰略家，非常結實的身體，不高不矮的身段。他有着堅定不拔的精神。在中國人民解放運動中，他和毛澤東是二位賢明的領袖。六十三年前他誕生於四川儀隴縣一個窮苦的農家。在青年時代，朱德是很鹵莽的，冒險的，及勇敢的。他接受了小說的影響，水滸傳上「好漢」的故事，及三國演義上英雄的功業，都很影響了他。他在他的四川本地的田野及山地上打過許多次仗。他自然就傾向於戰事生活了。由於他家族的政治勢力的協助，他便保送入雲南講武堂，他是中國第一批受現代軍事訓練的陸軍學校的學生之一。雲南講武堂畢業以後，他就委爲陸軍中尉，而投入本地所謂的「洋軍」中，因爲它是用西洋操法和西洋戰術的，並不是用中國軍樂行軍的，及因爲武器是用上刺刀的「洋槍」的緣故，所以稱做「洋軍」。

在一九一二年推翻滿清政府之役，雲南的新軍站在一個極重要的地位，朱德率領了一營新兵，立刻顯出他是民國的一員戰將。一九一六年，袁世凱企圖恢復國制的時候，他是一個旅長，他和他的雲南軍隊在蔡鐸將軍領導之下，首先揭起了反對的旗幟，這個爲袁氏稱帝的企圖判定了死刑。這一次，朱德開始爲中國南部各省認爲他是蔡鐸的「四虎將」之一。

從此以後，朱德的聲望就成立了他的政治地位，就立刻隆重起來，他先做雲南府的警察局長，隨後遷雲南省財政廳長，雲南和四川的老百姓都知道當時的官府都備具二個條件：第一，他們都是貪贓枉法的，第二，他們都是吸鴉片煙的。朱德是兩樣都犯的。生長在吸鴉片煙和喝茶一樣普通的地方，

MG  
K8252  
322

生長在雙親都把鴉片塗在甘蔗上來逗引他們的哭泣小孩的地方，他的成爲一個鴉片鬼，當然是無可避免的。當時的政界都認爲侵吞公款是做官者對於他自己的家族應盡的責任，他看了他上官的樣，他操縱他主持下的各種專利，增加他和兒孫的財富。

他也是一個多妻的人。據說他一共有九個老婆。他爲了她們和他的許多子女，在雲南省城裏造了一座極富麗的房子，我們可以說他所渴望的一切，他都得到了：財富，權力，愛情，子女，墨粟夢，人家的尊敬及一個舒適的將來。實際上，他只有一個真正的壞習慣，保證他不會覆亡的，他歡喜讀書。

朱德直到現在，還是一個純粹的寫實主義者。他的品性中似乎潛伏着理想主義及革命的氣質。受了讀過的書的影響，及一些留學生偶爾說及雲南府的退步的影響，他逐漸地了解一九一一年革命的對於全國人民是完全無關的；這純是一個新的專制政治替代了一個舊的專制政治罷了。再有可說的，就是他厭倦這種政治。他似乎有一種恥辱的感覺，同時他再有和西方英雄爭雄的野心，及使中國現代化的志願，他書讀的愈多，他就愈覺得他自己的無知及中國的退步。他需要研究，他需要旅行。

一九二二年，朱德在雲南府把他的妻妾給資遣去。知道中國的頑固情形的人，特別是在雲南這封建區域裏，對於這件離婚的事情是不甚相信的，這也表示了朱德的獨立的及有決心的人格。離開雲南他到了上海，在這裏他碰到了國民黨的許多青年革命家，他就加入了國民黨。也在這裏他與左翼的過激主義者接觸了。他們看他是一個舊軍閥，從雲南封建社會裏來的一個貪官，一個多妻將軍，一個煙癮極大的鴉片鬼——這樣的人也能夠革命嗎？

接受了他朋友的忠告，朱德就決心戒煙。這是不容易的，因為他差不多在兒童時代就吸大煙的。但是這個人是有鋼一般的意志的。在和這種毒物奮鬥的時候，他有一個星期睡在牀上幾乎完全失去了知覺，既而恐怕他或許要削弱，他戒絕的決心，他就趁了一隻航行長江的英國輪船，向漢口進發。在船上沒有鴉片賣也買不到鴉片，他在船上在長江裏上下了好幾次，時常在甲板上踱來踱去，絕不上岸，同這個最先的敵人作戰。在船上住了一個月以後，他離開了輪船，這時候他有清明的眼睛，有紅潤的臉面。在他一生的歷程中有了新的信心，他是完全戒絕了，他開始了他的新生命。

朱德現在大約四十歲，他的身體極康健，他的求知的心極熱烈。跟着幾個中國學生到德國去，在哈諾佛（Hanover）附近住了一些時候。在這裏他碰到了許多共產黨。在這個時候，他似乎專心研究馬克斯主義，而潛心於社會革命的新學說。在這個研究中他由一個年紀輕到足以做他自己兒子的中國青年教導着——因為他從來沒有學過法文，他只懂得一些德文，及他是一個外國話說得很不好的人。他在德國的一個「學生先生」告訴我，他是怎樣的熱心，怎樣的有耐性，肯吃苦，有毅力，去研究一個新世界的理想，了解了它的真理和意義，他丟棄了他傳說的中國訓練的一切偏見和限制，真是多麼聰明的一回事。

在這個方法下，他讀了許多世界大戰史及熟悉了歐洲的政治情形。一天他的一個「學生先生」很興奮地說到國家與革命這本書。朱德要求他幫着他唸這本書，從此以後，他對馬克斯主義及俄國革命發生興趣。他讀布哈林（Bukharin）的共產主義ABC及他的其他的唯物論的著作，接着再讀了許多列寧的著作。當時德國的革命運動打動了他，同幾百個中國學生，去參加世界革命的鬥爭。

他加入了在德國成立的中國共產黨支部。

「朱德有一個經驗豐富，紀律嚴明及切合實際的頭腦。」在德國知道他的一個同志告訴我。他是一個絕端樸實的人，謙遜而不自負，他常常請人家批評，他有請人儘量批評的脾氣。他對於共產黨的興趣是從他的同情勞苦大衆出發的，也是這個原因使他加入了國民黨。有一個時期，他是很信仰孫逸仙的，因為孫氏是主張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但是等到他了解了馬克斯主義，他覺得孫逸仙的步驟是有欠正確了。

朱德也曾經在巴黎住了好些時候。在這裏，他進了國民黨前輩吳稚暉爲中國學生創辦的一個學校。在法國和德國，他坐在年青的德國、法國及中國教師身邊，他小心地聽着，問着，辯論着，以求了解。「要現代化，要了解革命的意義。」他的年青的教師重複地對他說，「你一定要到蘇俄去。那裏你能夠看到將來。」朱德又接受了他們的忠告。在莫斯科，他進入東方勞工大學，在中國教師指導之下研究馬克斯主義。一九二五年底，他回到上海，從此以後，他在共產黨指導之下工作着，在這裏沒有多少時候，他就擠上了領導的地位。

朱德又加入他老上司朱培德的隊伍。朱氏在國民黨軍隊中的勢力，蔣介石之下，就輪到他。一九二七年朱培德佔領長江南部各省的時候，他委朱德做南昌公安局長，同時兼任軍官學校校長，那裏他與駐紮在江西更南部的第九軍有了接觸。第九軍中有幾隊兵從前在雲南是由他統帶的。因此計劃好了南昌的八月暴動，從這裏起，共產黨軍隊揭開了對抗國民黨的長期鬥爭的序幕。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是朱德決定他日後事業的一日。他不執行總司令朱培德壓平武裝農民

叛變的命令，便是同他們聯合起來和臭惡的過去的聯繫斷絕關係，而公開的做一個紅軍。他選定後面一條路，在賀龍大敗之後，他帶了他的警察及軍官學校學生跟着叛變者一齊向南方進發，在他後面關着的城門象徵着他青年時代的安全及成功的最後結束。擺在他面前的，是長期的和繼續不斷的鬥爭。

一部分的第九軍也跟着朱德走，這一隊革命的隊伍疾馳過汕頭的時候，就佔領了這個地方，旋被擊退，再退到江西及湖南。那時候他們並不自稱紅軍，他們只稱他們是國民革命軍。自從福建敗退以後，朱德的兵力大部分犧牲了，只剩下九百個人，五百枝步槍，一挺機關槍，和每人幾發彈藥而已。

在這個情勢之下，朱德採取了下面一個建議：和大軍駐紮在湖南南部的另外一個雲南軍司令方希聖（譯音）將軍聯合起來。希望從政治方面利用他們來抵抗蔣介石。方將軍本人雖然不是共產黨，他的軍隊中有很多共產黨的。因為他是一個雲南人，他也願意給他的同鄉一個避難的所在。這裏，朱德的軍隊就改編為第一百四十團。他本人就做了第十六軍政治部主任。在這裏，他就逃過了他的生命。

在方希聖將軍的軍隊中共產黨的勢力很快地擴張着，不多幾時，一個反布爾什維克的團體組織起來，與蔣介石秘密聯絡，計劃突擊朱德。一天晚上他只帶了四十個心腹在一家小旅館內住着。那個團體的領袖郝家龍（譯音）就率領了一隊兵來攻擊他。就立刻開火，那時候天已黑了，刺客也看不清楚他們的目標。當幾個人齊用手槍瞄準朱德頭顱的時候，他很興奮地叫起來，「不要打我，我只是一個廚子。不要打一個能夠為你們做菜的人。」那些士兵，吊了他們的老胃，躊躇着，把朱德帶到露

天來仔細辯認。那裏他被郝家龍的表弟認出來叫道：「這是朱德，打死他！」但是朱德立刻拉出他自己藏着的武器，槍殺了他，戰勝了他的守衛，逃走了。只剩五個弟兄同他逃了出來。

這個意外事件解釋了朱德在紅軍中所以有「廚子頭腦」的綽號。

回到團部，朱德通知方希聖，他即辭職。這一次據說方氏還送五萬塊錢給他表示好意。因為反蔣（介石）的爭論還沒有明白決定，而這些青年共產黨對於他的下級軍官及弟兄發生了很大的影響，是他所不敢輕視的。但是幾個月以後，事實證明送錢的事是不確實的。這一小部份軍隊只是忠於朱德及他的幾個下級軍官而集合起來的。黨的工作很混亂，確定的路線沒有成立，戰略也沒有決定。朱德的軍隊仍舊穿了國民黨的軍服。但是它們都破舊了，有許多人也沒有鞋穿，吃極粗糲的東西，有時候甚至於完全沒有東西吃，使得他的軍隊逃亡了一些。但是廣州方面傳來的消息，建議了一條明確的行軍路線，給他們許多鼓勵。朱德改編他的軍隊成三隊，叫做「農民縱隊」，移到湖南江西及廣東邊境在這裏他與由一個過激主義的學生率領的一隊土匪聯合起來，開始取消租稅，重分土地及充公富人的財產。經過了一場血戰之後，就佔領宜章縣做根據地，這一個年青的軍隊就吃南瓜及作政治辯論過了冬。

同時，毛澤東的農軍敗退湖南，最後退江西及湖南邊境的井岡山，在這裏他得到匪首王佐與袁文才的援助。這兩個佔有附近二縣，在山上已經築好了極難攻破的根據地。毛澤東的「農工紅軍」與朱德的駐地相去很近，毛氏就派他兄弟毛澤丹來和他（朱德）接洽。他帶了黨的訓令來聯合軍力，他也帶了游擊戰，土地革命，及建立蘇維埃的確定計劃來。一九二八年五月，這兩軍就在井岡山聯



繫起來，他們控制五個縣分，有五萬個信徒。其中四千人的武裝是步槍，二萬人的武器是長槍，大刀，和鋤頭，其餘的都是非武裝的黨的工作人員，宣傳員，或戰士的家屬，包括很多的兒童。

這是朱毛結合的開始，他們創造往後六年的中國南部的歷史。此後的故事，各人都很知道了。毛澤東已經講過蘇維埃及紅軍發展的過程。朱德隨着蘇維埃發展的同樣的曲線成爲一個所向無敵的軍事領袖。

一九三一年，舉行第一次蘇維埃會議的時候，全場一齊選舉朱德做紅軍總司令。在二年之內，建立了四個軍團，有五萬枝步槍，幾百架機關槍（這大部分是從敵人方面奪來的），共產黨控制了江西南部大部分的區域及湖南福建的一部分。加緊的政治訓練開始了，兵工廠建立起來了，共產黨全體都了解初步社會革命的經濟及政治改造了。紅軍制服都日夜的翻製，供給新的游擊隊應用，革命的道德是「變強」了。二年多一些，紅軍已經擴充了一倍。

在南方這幾年，朱德率領了紅色聯軍，打了幾百次小仗，打了幾十次大仗，衝破了五次大圍剿，在最後一次圍剿中，他要抵擋武力（包含重炮隊，飛機隊及機械化部隊）超過他八九倍，資源超過他許多倍的敵人的進攻。可是他的勝敗的程度是須要比較一下的，我們必需承認，戰術的靈活，巧妙的運動，和隨機應變的行軍，他重複地證明他能夠戰勝敵方的每一個軍官，無疑地在游擊戰中他養成了中國革命軍隊的堅強的戰鬥力。紅軍在南方的大錯誤是戰術的錯誤，這是政治領導必需負極大的責任的。雖然有這些錯誤，紅軍在第五次圍剿中無論在那一方面仍舊能夠抵住敵人的進攻。

上述的純粹的戰略及大軍撤退時戰術的運用，朱德在「長征」中的優越的領導在中國是空

前的事。領袖的吸引力和那少有的人類品性，感動了他的弟兄使他們絕對信仰和忠心，敢爲主義而死。——這是必定要歸功於紅軍的不能擊破的團結力，使得他的軍隊在風雪凜烈的西藏高原抵抗「圍剿」，祇吃犂牛，度過了艱難可怕的冬季。在我至少不能完全想像蔣介石、白崇禧、宋哲元及國民黨其他任何將領能够在這種環境中生存着，更不要說在受了這種種辛苦之後，還能夠四師大舉攻擊，攻破了敵軍從容佈置了好幾個月的防綫。這就是在我騎馬游歷西北的時候，朱德所做的事業。

難怪中國謠傳他有各種神奇的本領：能夠看清楚周圍一百里以內的東西，能夠飛行，能夠運用道術，如呼風喚霧打擊敵人。因爲有千萬個槍子和炮彈沒有打死他，迷信的人相信他是打不死的。因爲國民黨屢次宣布他已被擊斃，並且敘述他擊斃時的詳情，有人說他能夠復活的。千萬人都知道中國的「紅德」，而因爲各人之立場不同，有些人認爲他是惡魔，有些人認爲他是燦爛的明星，但是每個人都承認這十年的歷史上有他的名字的。

可是人家都說，朱德的相貌並不動人——一個鎮靜，謙虛和說話溫文的人，大眼睛（和善的眼睛是他普通的表情）箇子很矮很胖，有着鐵一般的臂膀和腿。他現在五十歲開外了，是五十三或五十四歲，就沒有確實地知道了。——但李長林笑着告訴我，他曾經說過他到現在能够記得的，他是四十六歲。這對於他自己似乎是一件笑話。李氏想他自從和他康克清女士結婚了以後，他就停止計算他的年齡了。她是一個極能幹的婦運領袖，她是一個好的槍手和騎師。她是一個統帶她自己的游擊隊的巾幗英雄。她肩上擱着受傷的同志，她是和男人一樣粗手大脚的女子，很率直的，健康的和勇敢的。

朱德對待弟兄的忠心是人人知道的。自從當了紅軍總司令以後，他的衣食住行都和士兵一樣，同黨士兵的辛苦。早期常常赤腳走路，有一個冬季專吃南瓜生活，另有一個冬季專吃犁牛，永遠不叫苦，很少生病。據說他歡喜在軍營裏散步，同弟兄坐在一起講故事，或同他們遊戲。他兵打得很好，籃球也打得不弱。每一個士兵都能够直接向總司令訴苦，——事實上常是這樣做的。朱德叫他弟兄的時候，就脫下他自己的帽子。在「長征」途中，就把馬借給疲乏的同志騎，自己走很長的路，一些也沒有倦容。

可是做了紅軍的犧牲的人，無疑地看他是一個人類的一個惡魔。階級鬥爭不曉得慈悲的。許多紅軍的恐怖故事，現在沒有人相信了，但是認爲朱德不知道殺人有時候是一種「革命的需要」也太嫌忠厚。爲了完成他的任務，他就得把他自己的忠心整個獻給被壓迫的民衆，在這個任務中，他不能夠比授權給他及他所服從的民衆更爲慈悲。所以除非你相信民衆不殺人，朱德手上不是沒有鮮血的，但是你把它看做外科醫生的血或是劊子手的血，那就要看你自己的哲學或宗教，偏見或人類的同情來決定了。無論如何，朱德不是聖人，但是在他自己的民衆中，在中國極大多數的勞苦大衆中，他是一個高舉着解放火炬的可愛的人，他的名字在爲中國人類自由而鬥爭的人中，已經是不死的了。

## 來自田間的彭德懷

蔣介石的南京政府，曾經出了一筆足以維持一個軍一個月以上的軍費，懸賞購買彭德懷的頭顱，可是彭德懷至今健在，仍舊領導着人民解放的鬥爭，而那些懸賞通緝他的人們，却已經從中國大陸的地平線上沒落下去，或者已經走到沒落的邊緣了。

當我在八九兩月到前線去參觀的時候，紅軍第一、第二及第四方面軍的統一的指揮還尙沒有實現。紅軍第一方面軍有八師軍隊把守着從寧夏的長城直到甘肅的沾源和平涼的一條綫。第一軍團的前鋒正向着南方和西方推進，替朱德打開一條路來。朱德正率領着第二及第四方面軍，從西康和四川過來，衝破南京軍隊在甘肅南部的嚴密的防綫。豫旺壩是寧夏西南部的一個回族的故城，是第一方面軍的總司令部，在這裏我找到了第一方面軍的總部人員和彭德懷總指揮。

彭氏做「紅軍」的事實大概是在十年以前開始的。那時候他在國民黨多妻軍閥何健將軍的軍隊裏發動了一次暴動。他是從隊伍出身的，曾獲得了在軍事學校讀書的機會，第一次在湖南，後來在南昌。畢業以後，他很快地使他自己成了名，很快地升着官。一九二七年，雖然只有二十八歲，他已經做了旅長，而在所有的湖南軍隊裏，都稱他爲「自由主要者的」軍官，因爲他有什麼事情，必定和他的士兵委員會商量的。

當時彭氏在國民黨左派中，在軍隊中，在湖南軍事學校的勢力，對於何健實在是一個嚴重的問

題。一九二七年冬天，何將軍開始肅清他軍隊裏的左派人物，舉引了湖南有名的「農民大屠殺」，其中好幾千急進的農民和工人，都被當做「共產黨」而屠殺了。但是對於彭氏，因為他已經有了盛名，還猶豫着，不敢下手。這一次的猶豫使何氏吃了大虧。一九二八年七月，彭氏用他自己有名的第一旅當做核心，聯絡了第二、第三旅的一部分士兵和軍事學校的學生，和一個農民暴動結合著，發動了平江叛變，成立了一個湖南蘇維埃政府。

兩年以後，彭氏招集了八千個同志組成一個「鐵軍」，這就是紅軍的第五軍團。就用這個軍隊他攻打並且佔領了湖南省城長沙，擊走了何健的六萬軍隊——那時候他們一大半是鴉片鬼。紅軍佔領了這個城十天，抵抗着湖南軍隊及南京軍隊的聯合進攻，但是最後在日本英國和美國軍艦的猛烈轟擊之下被迫撤退了。

在這件事不久以後，蔣介石就開始了他第一次大規模的「紅匪」肅清圍剿。這些次圍剿的情形已經在前面大體說過。

在南方紅軍的「長征」中，彭德懷是第一軍團前鋒部隊的總指揮。他衝破了好幾萬敵人軍隊的防綫，在前進的路上奪到了重要的據點，替主力部隊獲得了通路，最後獲得了到陝西的路徑，而在西北的蘇維埃根據地住了下來。在他的部下的士兵告訴我，二萬里的「長征」途中，他都大部分步行的，常常把他的馬讓給疲乏的或受了傷的同志去騎。

他有了這樣鬥爭的歷史，我想彭氏一定是個疲憊的，嚴峻的，古怪的領袖，或殘廢者。但是相反的，他卻是一個快樂善笑的人，除了胃口很小之外，他的身體極健康。他的胃口是在長征途中糟塌壞的。

在「長征」途中，他有一星期不得不喫沒有煮熟的飯和草，以及喫些半含毒質的東西，有幾天甚至於完全沒有東西吃。他是一個身經百戰的老將，可是他只受過一次重傷，以後受到的都是些輕傷。

在豫旺壩我住在彭氏司令部所駐紮的地方，所以在前綫我會見他的次數很多。這個司令部那時候指揮着三萬多的軍隊，是一間很樸素的屋子，裏面有一張桌子，和一條木櫈，兩個鐵的行李箱，一些紅軍畫的地圖，一個軍用電話，一條面巾和一只面盆，在坑上鋪着他的被褥，他和他的士兵一樣，只有兩身軍裝，而且在軍裝上面是沒有等級符號的，他只有使他像小孩那樣驕傲着的衣服，這是一件背心，是在「長征」途中射下的敵人飛機上所得到的，一把降落傘做成的。

我們在一起吃了許多次的飯。他吃得和他的兵士們一樣節省和簡單。飯食普通是白菜，麵條，蠶豆，羊肉，有時候也有麵包。寧夏出產各種甜蜜的瓜類，這是很喜歡吃的東西。可是我發現彭氏在喫瓜的競賽中是失敗了，他不得不對司令部裏的一個軍醫低頭，這個軍醫因為他的喫瓜本領特別好，得到了「喫瓜大王」的綽號。

我必須承認彭氏給我的印象是極深的，在他的行動和談話中，我覺得他有中國人性格中很少有的某種坦白爽快和正直的品質，這是我極喜歡的。他的行動和談話都很快，他是一個極會開玩笑的滑稽大家。他的體格很健全，是一個很好的騎師，一個能喫苦的人。這個一部分因為他是一個不吸煙者和節慾者的緣故。有一天在紅軍第二師野外演習的時候，我和他在一起。我們必需爬一個很峻峭的山，「跑上山頂去」彭氏突然對我和他的氣喘着的總部人員這樣喊着。他像一只兔子一樣地竄了上去，到山頂的時候他把我們全體擊敗了。有一次，當我們騎馬代步的時候，他又同我們挑戰了。

在這種情形以及一些別的情形之下，再表現着他還有極多的精力存着沒有用。

彭氏是睡得晚而起得早的，他和毛澤東睡得晚起得也晚不一樣的。據我知道彭氏平均每晚只睡四小時或五小時。他永遠不慌張，但他是永遠忙的。我記得我是怎樣詫異，有一天早晨，第一軍團接得命令，推進二百里到海源敵人的區域裏。彭氏在早餐以前頒發了各種必需的命令，下來和我一同喫飯。接着他開始出發，好像是到郊外去作一個短旅行，他在豫旺壩的大街上和他總部的人員一同走着，中途上又停着一羣來送行的回教祭司談話。他的大軍好像自己在單獨進行一樣。

很奇怪的，雖然政府的飛機常常散佈傳單到紅區裏，懸賞五萬到十萬元，提拿彭德懷——死的或者活的。可是在他的司令部前總只有一個哨兵站崗，而且他在大街上，走來走去，從不帶一個衛隊。當我在那裏的時候成千的傳單從飛機上散發下來，懸賞捉拿他和徐海東及毛澤東。彭德懷卻下令說把這些傳單保留他。因為他們只有一面印了字，而紅軍正感覺到紙荒。這些傳單的背面，以後是用來印刷紅軍宣傳品的。

我看到彭氏是很喜歡兒童的，他常常被一羣兒童們跟着。其中許多孩子，竟當了送信童子，號兵，傳令兵，及馬夫等，都編入紅軍的正式隊伍，名字叫做「少年先鋒隊」。我常常看見彭德懷和兩三個「小紅鬼」坐在一起，和他們認真地討論政治問題或和人的困難。他很尊敬地對待他們。

有一天我與彭德懷及一部分的總部人員去參觀一個離前綫很近的小兵工廠，去參觀工人們的娛樂室，他們的列寧堂。在屋子的一邊，工人畫了一張大漫畫。他畫着一個仁丹鬍子的日本人，他的脚踏在滿洲熱河和河北的上面，手中高舉着指揮刀，刀上還滴着血，刀對着中國的其餘的部分。這張

漫畫上的日本人，有一個大鼻子。

「那個是什麼人？」彭氏問一個看守列寧堂的少年先鋒隊。

「那是一個日本帝國主義」小孩回答說。

「你怎麼知道的呢？」彭氏追問着。

這個小孩子的回答是「你看他的大鼻子吧！」

彭氏笑着望着我，指着我說：「那麼這裏有一個洋鬼子，他是一個帝國主義嗎？」

「對的，是一個洋鬼子。」先鋒隊回答說：「但是並不是一個日本帝國主義。他有一個大鼻子，可是還不如一個日本帝國主義那麼大！」

彭氏高興得縱聲大笑，從此以後他開玩笑地叫我大鼻子。事實上，在東方社會裏，我的鼻子是正常的，不討人厭的，但是對於中國人都以為外國人都是大鼻子。我對彭氏提出這樣的漫畫，在紅軍真正和日本人接觸的時候，會發生很大的錯誤，因為日本人的鼻子，是和他們自己的鼻子一樣大的。他們會認不清敵人，而拒絕作戰的。

「不必擔心。」總指揮說：「我們會認清每一個日本人，不管他有沒有鼻子！」

有一次我同彭氏去看彭氏第一軍團的「抗日劇社」演戲。我們同一些別的士兵一起坐在臨時舞臺的草地上。他對於這些戲劇好像很有興趣，他起來領導着唱了一個最流行的歌曲。雖然那時候只是八月底，天黑了以後，却已是冷風刺骨，我把我的棉襖緊緊地裹着身子。在戲劇演到中間的時候，我突然發現彭氏已經脫去了他自己的棉襖。原來他早把他的棉襖披在一個坐在後面的小號兵



的身上。

後來我纔明白了彭氏所以喜歡這些小鬼的道理來，有一天晚上，他允許了我的請求，把他兒童時代的情形講些給我聽。他自己幼年時代的境遇，在西方人聽來，是很奇怪的，可是在中國，這些是極典型的事情，他解釋了爲什麼中國現在有許多青年看起來是「紅色」的了。

彭德懷生於離長沙大約九十里的湘潭縣的一個鄉村裏，在碧澄澄的湘江旁邊，是一個富足的農村。湘潭是湖南風景最優美的地方之一——綠色的鄉村，有肥沃的稻田，茂密的竹林，和稠密的人口。只是這一縣就有一百萬人以上的人口。但是湘潭的土壤雖然很肥沃，而大多數農民都是極貧窮的，不識字的，照彭氏說起來，他們只「比農奴微微好一些」。在那裏，地主最有勢力，擁有最好的田地，因爲他們在許多情形之下，同時也是政府的官吏，他們任意徵收額外的田租和捐稅。

「湘潭有幾個大地主，每年能收到四萬到五萬擔的米，而全省有幾個最富足的米商就住在這裏。」

彭氏自己的家庭是富農。他的母親是在他六歲的時候死的，他的父親就續娶了一個妻子，這個後母因爲彭氏是前母的兒子，很是憎惡他的。她把他送到一個中國的舊式學校去，那裏老師常常打他。很明白的，彭氏是很有能力照顧他自己利益的，當老師有一次打他的時候，他舉起一張板櫟打中了老師，就跑走了。這位老師在地方法院控告他，他的後母不認他做兒子。

在這一次的口舌中，他的父親並不關心，但是爲着要他的妻子保持和平起見，他把這個搗板權的孩子送到嬸母家裏去住。她是彭氏很愛戀的一個人。她把這個孩子送到一個「現代」學校裏去。在這裏他碰到了一個非孝的「急進」老師。有一天，彭氏正在校園裏玩耍的時候，這個老師走到他面前，坐下來和他談話。彭氏問他不是崇拜他的父母，並且請他猜猜彭氏自己對父母的態度。那老師說，就他自己說他是不相信這些迂腐的道理的。小孩子由於父母的求快樂而生出來的，這個正與你（德懷）在這個校園裏求快樂一樣。

「我很領會這種見解，」彭氏說：「所以我在回到家裏的時候，就把這些話對嬸母說了。她聽了駭然，在第二天就叫我從這個惡劣的「外國勢力」中退了下來。聽見了這個孩子的非孝的說法，他的祖母就經常地在「每月初一、十五、節日，有暴風雨時禱告着，」求天打死這個不孝孫子。

以後就發生了一件驚人的事，這件事最好用彭氏自己的話來說明：

「我的祖母把我們大家都當做她的奴隸。她是大煙鬼。我最恨鴉片的氣味，有一天，我實在再忍不住了，我就立起身來，一脚把她放在火爐上的煙鍋踢倒了。她大大地生氣，就召集了全體親族長，列舉了我許多的罪狀宣布我是一個不孝的孫子，正式要求把我活活的淹死。

「族中人正預備實行她的請求了。我的後母贊成我應當處死，而我的父親說，這既然是全家的意見，他也並不反對。這時候我的一個母舅——我自己母親的兄弟，站起身來，劇烈攻擊我的父母，沒有把我適當地教訓好。他說這是父母的錯誤，在這種情形之下，小孩是不能負責的。

「我的性命就保全了，但是我必須離開家庭。那時候我才九歲。那正是很冷的十月天氣，除了我

的衣褲以外，我便什麼東西也沒有。就是這一身衣褲，我的後母也想取了去，可是我證明，這身衣褲不是她的，是我的生母給我的。」

這就是彭德懷的生命在這個大世界中的開始。他起先得到了一個牧童的工作，後來又做煤礦工人，在那裏他每天要拉十四小時風箱。這樣長時期的工作，把他悶慌了，他逃出了煤礦去做一個鞋匠的徒弟。在那裏每天只做十二小時的工，比以前已經好得多了。他拿不到薪水，在八個月以後，他又逃走了。這一次他跑到一個硝酸工廠裏去做工。這個工廠倒閉了，他不得不再去找工作做。現在除了背在他背上的爛布之外，他仍舊什麼東西都沒有。他改做築隄工人。在這裏他有了一個「好的職業」——實際上領到了工資，他在兩年中積蓄了十五串錢——約大洋十二元！但是因為換了一個軍閥，省鈔就變成毫無價值的東西，他於是又「喪失了一切東西」！這個使他十分沮喪，決定回到家鄉去。

現在十六歲了，他去拜訪一個富足的母舅——那個曾經救過他的性命的母舅。這個人正新近死了自己的兒子，而且從前是很喜歡彭德懷的。他歡迎他並且供給了他一間屋子。在這裏彭氏愛上了他自己的表妹——而他的母舅是很贊成他們訂婚的。他們在同一個中文教員那裏讀書，在一起玩耍，並且計畫他們的將來。

這些計畫被彭氏的不可遏止的跋扈所打斷了。第二年在湖南有一個大米荒，成千的農民都無家可歸。彭氏的母舅接濟了許多人，但最大的米行，被一個大地主商人把持着，大大的賺了一筆錢。有一天有二百多個農民，聚在他家門前，要求這個商人把米平價賣給他們——這是在饑荒時代對於有道德人的一種傳統的要求。可是這位富翁拒絕了這種要求，把他們趕走了，關上了大門。

彭氏接着說：「我正從他家門前經過，停下來觀察這種示威行動。我看這些人大半已經餓得半死，我知道這個富翁在他的倉裏有一萬多石米。可是他完全拒絕幫助這些饑餓的農民。我不禁怒火中燒，領着農民攻打並且衝進他的家去。他們把他倉裏的米運走了一大半。以後我想起這件事情時，我不知道當時爲什麼要那樣做。我只知道他應該把米賣給窮人，不然的話，把他來搶走，是很對的。」

彭氏又要再逃命了。這個時候他的年紀已可以投軍去了。他當兵的生活開始了，在不久以後，他並且變成一個革命人物。

在十八歲的時候，他當了排長，並且參加一種預謀推翻那時候當權的省長——傅督軍。彭氏被受了他軍隊中工作的一個學生領袖很深的影響，而這個學生領袖是被督軍槍殺的了。彭氏就擔任暗殺傅督軍的工作，他走進長沙，有一天等候着傅督軍在街上走過的時候，他對他扔了一個炸彈。可是這個炸彈已經着了潮，並沒有爆發。彭氏逃走了。

不久以後，孫中山做西南聯軍總司令，並打敗了傅督軍，可是很不幸的，他又被北方軍閥逐出湖南。彭氏就跟着孫氏的軍隊一同逃走。這裏，孫氏的一個軍長——程潛——派他去做偵察的工作。彭氏又回到了長沙，這一次他爲人所賣而被捕了。那時候張敬堯正統治着湖南。彭氏敘述他的經驗說：「他們每天用許多不同的方法拷打我一個鐘頭。有一天晚間，把我兩只腳捆着，兩只手綁在背後，拿大石頭放在我的背後，獄卒站在我的周圍用腳踢我，逼着我招供——因爲他們對於我還沒有證據。我昏過去了好幾次。」

「這樣拷打了我一個月左右。在每次拷打之後我總想下次我要供招了。因爲我實在受不了。」

可是每一次我總是決定不等到第二天不說的。結果他們對於我沒有得到什麼東西，而且使我非常詫異的最後是我釋放了。我一生中最滿意的事，是幾年以後，我攻進了長沙，把那老刑房拆毀了。我們釋放了好幾百個政治犯，這裏面，有許多人，遭受了毒打，非人的待遇，以及飢餓，已經是半死的人了。」

當彭氏重新得到了他的自由以後，他回到他的舅舅家裏，去看望他的表妹。他仍舊以為他們已經有了婚約，打算和他結婚。可是他發覺她已經不在人世了。於是他重新去投軍，不久就被派到湖南軍官學校裏去讀書。畢業以後，他在魯滌平手下，充當第二師的一個營長，派他在本縣服務。

「我的舅舅死了。聽到了這個消息，我打算回去參加葬禮。在路上我必須經過我幼年時候的家。我的老祖母還活着，那時候她已經八十多歲，仍舊很健康。聽到我快要回去，她走十里多路來接我，要我原諒她過去的事情。她對我是很謙虛和很看重。我對於這種改變極為驚奇。這是什麼原因呢？後來我想到，這不是她的私人感情上，有了什麼改變，而是因為我從一個被社會拋棄的人，升做一個軍隊裏每月有二百元薪水的軍官，我給了她一些錢，他在家庭裏，稱讚我是一個模範「孝子」。」

我問彭氏，什麼書籍對他極有影響？他說，在青年時代，他讀了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他第一次發生了一些軍人對於社會的責任之重大的思想。「司馬光所描寫的戰爭，完全是無主義的，對於人民只是一種痛苦——正像在我自己的這個時代，中國軍閥的互相戰爭一樣。我們怎樣纔能夠使我們的鬥爭成了一個有目的鬥爭，求保一個一勞永遠的改革呢？」

彭氏也讀過了影響毛澤東的許多作家，如梁啟超、康有為等的書籍，有一個時期，他對無政府主

義，有些信仰。陳獨秀的新青年，使他對社會主義發生了興趣，從這裏出發，他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那時候國民革命正在形成，他是一個旅長，他覺得需要一種政治的主義貫輸到他的軍隊裏。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對梁啟超的一種改進，」但是彭氏覺得它「太虛空和雜亂了。」雖然彭氏自己那時候是一個國民黨。鮑哈林的共產主義A、B、C，對於他好像是「第一本提出了一個切實而合理的社會及國家形式的書。」

到一九二六年，彭德懷已經讀過了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大綱，新社會觀（一個著名的中國共產黨員所著的）考茨基的階級鬥爭，及一些關於中國革命的唯物論的解釋的論文和小冊子。彭氏說：「以前我只是對社會不滿意，而沒有看到實行任何基本改進的機會。讀了共產黨宣言之後我放棄了我的悲觀，開始懷着一種「社會一定能够改變」新信心而工作着。」

雖然彭氏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沒有加入共產黨，可是在他的軍隊裏，他接受了共產黨青年人的幫助，在政治訓練方面開辦了馬克思主義的課程，並組織了士兵委員會。一九二六年，他與一個共產青年團的女團員一個女中學生結了婚，可是大革命中，他們就分散了。自從一九二八年起，彭氏沒有看見過她。在那年的七月裏，彭氏叛變，佔領平江，開始了他的反叛者——或土匪的事業。

他告訴我這些青年時代所發生的事情和鬥爭的時候，他在屋裏來往地踱着，一邊笑着，談諧着，他的手裏拿了一根蒙古馬鬃做的驅蠅鞭，心不在焉地揮着來加重說話的語氣。一個信差送來了一邊電報，在他打開來看牠們的時候，他忽然地又顯出莊嚴的指揮官的神氣來。

「好了！我所要說的都說完了。」他總括起來說，「這些話多少闡明了一個人是怎樣會變成一

個「戰士」的？」

### 突擊戰術家林彪

林彪是湖北省一個工廠主人的兒子，生於一九〇八年。他的父親因苛捐什稅而破產了，然而林却設法在初級小學卒了業，就到了廣州黃埔軍官學校去念書。他在那兒成績很優秀。他在蔣介石及其首席顧問俄國加侖將軍之下，受了政治和軍事訓練。畢業不久，國民革命軍北代就開始了。林彪升做陸軍上尉。一九二七年，他二十歲，在著名的張發奎的第四軍那裏當上校。當年八月，在南京右派政變以後，他帶了一團人加入賀龍、葉挺所統領的第二十軍，在南昌暴動，這就是共產黨在中國的反抗的開始。

林彪是極少數從沒有受傷過的紅軍指揮官之一。他在前線參加了百餘次的戰爭，在疆場上指揮了十多年，飽受了他部下所熟習的困苦，南京方面又懸賞了十萬元緝拿他的正身，可是他還是好好的生活着，沒有掛過彩。

在一九三二年那年，林彪任紅軍第一軍團總指揮，這一軍團在那時有兩萬枝步槍，是紅軍中最有威力的一部。因為林彪的非常的軍事天才，這一軍團把政府派來勦共的軍隊一一擊破，打敗，或繳械，而本身從沒有失敗。據說政府軍往往只消一發覺他們的對手是紅軍第一軍，他們就敗退了。然而關於這有名的「鐵軍」的事跡，且等我將來到了前方再說。

林彪同許多善戰的紅軍指揮官一樣也從未出過國，除了本國語以外，他不能讀不能講任何國

家的語言。然而，不到三十歲的年紀，他已經博得了在紅軍範圍以外的稱許。他發表在中國共產黨軍事雜誌鬪爭和戰爭與革命上的文章，在南京的日本以及蘇聯的軍事雜誌上都轉載過，批評過。他被稱做突擊戰術的發明者——這種戰術馮玉祥將軍曾詳細地註釋過的。紅軍第一軍的許多勝利據說都是因為善於運用「突擊」戰術的緣故。

一天早上，我同林總指揮及其教職員們走到離保安城不遠的紅軍大學去。我們到那裏，是在課餘時間。學生們有的在兩個有設備的球場上打籃球，有的在圍繞保安邊界的黃河支流畔，用泥土填平的球場上打網球。還有好些學生在打檯球、寫字、閱讀新書和雜誌，或者在他們簡單的俱樂部裏讀書。

這是大學的第二部，學生有兩百多。這大學在蘇區時稱為「紅大」，共有四部，八百多學生。保安附近，在教育委員會管理下的，除了「紅大」還有無線電報、騎兵、農業及醫藥等學校，以及一個共產黨訓練學校和一個民衆教育訓練所。

聚集了二百多學生聽我講演「英、美政策」。我把英、美的態度作了一個簡略的概括的歸納，並且答應解答他們所要問的問題。我當時就覺得這是大大的失着，而那頓麪食難以抵償我的窘態。那些向我提出的問題，雖有韋爾士那樣的急智和辯才，大概也要覺得難以作答的罷。你想，你怎樣回答下面這樣難倒我的問題呢？

「英國政府對於親日的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成立，以及日軍駐防華北這兩件事採取何種態度？」



「美國藍鷹運動的方案的結果怎麼樣？對於工人階級有何利益？」

「如果中日開戰了，德意可會援助日本的麼？」

「如果日本得不到別國的援助，你以為日本有多少時候能支持對中國的大戰呢？」

「國際聯盟爲什麼失敗的？」

「在英、美兩國，共產黨都是法律所許可的，可是兩國卻都沒有工人政府，這是什麼緣故？」

「在英、美兩國反法西斯陣綫的發展情形怎樣？」

「以巴黎爲中心的國際學生運動的前途怎樣？」

「就你的意見，李滋羅斯這次訪問日本，可會釀成對華政策上什麼英、日協定的麼？」

「等到中國開始對日本抗戰了，英、美會援助中國呢，還是日本？」

「請問英、美兩國既是中國人民的朋友，爲什麼把軍艦和軍隊長駐在中國呢？」

「英、美工人對蘇聯的觀感如何？」

在兩個鐘頭的討論時間裏，可以談到的範圍就不小了，其實呢，時間並不限於兩個鐘頭。早上十點鐘開始，一直繼續到下午三四點鐘光景。此番討論到底得不到什麼結論，徒然浪費了一天的工作。過後我參觀了各個課室，與林彪及其他教職員談天。他們把「紅大」的投考情形告訴我，還拿了印就的章程給我看，這種章程已有好幾千份祕密地分散到全國各處了。「凡是志願與日本帝國主義作戰，志願爲民族解放獻身的投考者，不問是屬於什麼階級，不問其社會思想或政治思想有什麼不同，」紅軍大學的四部一律招收。年齡的限制是十六歲到二十八歲。「不論性別，」投考者必

須體格強壯，無傳染病，」而且——這一句似乎十分籠統——「不沾一切不良嗜好。」

據我所知，大學第一部的學生，實際上大多數是營旅或師的軍官，受着高級的軍事訓練和政治訓練。這一部所授的課程需時四月。照紅軍的規則，每個軍官或政治委員，每服公務兩年，必須在紅軍大學過這麼四個月。

第二及第三部招收着排長、連長和營長，以及紅軍裏經驗豐富的戰士，和「從中學或同等程度學校的畢業生挑選出來的新入伍生、失業的教師和官吏、抗日義勇軍、反日遊擊隊首領和從事於組織及領導工人運動的工作人員。」在紅軍向山西省進軍期間，該省有六十餘中學畢業生參加紅軍的。

第二及第三部的課程需時六個月。第四部以專門訓練工程師、騎兵、學兵和砲兵隊為主。我在一部碰見了幾個以前做過機械工人和學徒的學生。後來，我離開蘇區的時候，我走上長途汽車，還遇見從上海、北平趕來投考的學生。林彪告訴我，該大學一張報名單子上開列着從中國各處來投考的二千餘名，最重要的問題是入境的問題，因為每一學生都得秘密入境。

「紅大」各部的課目都是兩樣，可是第一部學生所學習的東西也又可以表示其大概了。政治講話，所包括的課目有：政治知識、中國革命問題、政治經濟黨的建設、策略問題、列寧主義與民主政治的歷史基礎、日本的政治社會力量等。軍事科目所包括的有：對日戰爭的戰術問題、對日的運動戰、抗日戰爭中游擊隊戰爭的發展等。

這些科目中，有幾種備有特殊的教本。他們對我講一部分教本是從江西、蘇維埃印刷局運來的，

在那印刷局的總廠裏，有過八百以上的印刷工人。又有幾種科目把紅軍軍官及共產黨領袖們關於俄國革命及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的演講稿子作為教材，或則利用所奪獲的政府的卷宗、文件和統計。

紅大這些科目也許是以解答「紅黨是不是真正要與日本作戰呢？」的疑問。這可以表明紅黨怎樣預知着，怎樣積極地規劃着他們認為無可避免的對日的中國「獨立戰爭」。要不是日本爲了什麼奇蹟，現在日本發着戰爭狂的軍部在廣大的中國領土裏決不能撤兵。

這想象不是愉快的。投資在中國的外國資本家有的認爲這是不可能的狂妄的預想。但是有的却能坦白地說，中國已有幾千萬人民變成日本所征服的奴隸，假使中國人現在能夠不再因不抵抗而再把本國的自由犧牲一些，而都抱着寧爲玉碎不願瓦全的決心，他們就不責難中國人了。

至少紅軍已堅決地打定了主意要抗戰，而且我們能相信他們在戰事開端時會站在最前綫，這事實非但在紅軍領袖們激昂的談話裏，在紅軍嚴格的實際訓練中，在他們要與其十年敵人，國民黨結成「聯合陣綫」的建議中間表示出來，而且在蘇區裏觸目皆是的深刻的宣傳工作上，也有着明顯的表示。

負着領導民衆的使命感的是許多的青年隊伍，就是「抗日劇社」，他們在蘇區裏不斷地作巡迴的旅行，散佈抗敵的宣傳，激發農民的民族意識。

第一次參觀了紅軍大學以後，我不久就去看這麼一次動人的兒童劇社的公演。

## 儒將陳毅

和許多共產黨員不同，陳毅並非農家出身；他的父親在滿清末年是一個縣官或府官。可是作官回來以後，他全家的生活却很是清苦。

一九一八年，陳毅在成都的甲種工業學校念書，足球踢得很好，因為打第四排，所以外號叫做『陳Four』。他的極靈巧的盤腳，幾乎可以把敵人腳上的任何球都勾來爲自己使用。

此後他考取留法預備學校，生活極爲刻苦，經常祇穿一件藍布長衫，冬天衣服也並不加厚多少。每天從家裏到學校，來回都要走十里的路。

他天資很好，古書讀得極多，兵書如孫子兵法等都讀過，但是讀這些書的目的並非爲了將來要帶兵，而是當作待人接物的參考。他常常手裏拿一本資治通鑑，詩人中間喜歡黃山谷和黃仲則，那個時候，他舊詩已經寫得極好了。

一九一九年，他考取官費留法，在出國以前，還買了兩大箱子的中國線裝書。那時五四運動發生，他受到很大的影響，立志要做一個有新思想的新青年。

他參加的是勤工儉學，到了巴黎，睡地板，吃白水麵包。後來便進克虜伯兵工廠，學習鐵錐工。從工廠不久又轉入一個聖日耳曼公學，他這裏便開始了愛國運動。

那時中國駐法公使陳籙，正與法國政府進行借款，把中國好多權益都抵押給法國人，陳毅便和

幾個同學號召全巴黎區的勤工儉學生，聯合表示反對，打了公使館的祕書。這時候他整天忙着起草宣言，書寫通信，因為他是那時同學中唯一能白話文的人。此時他已參加了中共的前身社會主義青年團。

這個以後，因李石曾、吳稚暉等用庚子賠款辦了一個中法大學，對於那批勤工儉學的學生，却要經過考試，並且繳納學費，方准入學，於是他們集合了一百零六人，由巴黎出發到里昂，直撲中法大學，加以佔領。陳籙急了，便勾結法國政府，說他們是共產黨人，命令警察加以逮捕，過後更用武力將他們押送回國。這是一九二一年。陳毅當時是二十歲。

回國以後，他就在四川的軍隊裏做了些工作。之後便在重慶新蜀報作了編輯。這個時期他曾經寫了一首詩，很足以表明他的個性：

「孩子，有誰欺負了你？」

有誰是你的仇敵？

你不要叫別人把他殺死，

你還要好好地保護他的生命，

好叫他死在你自己的手裏！」

在新蜀報兩年，他往北平進中法大學讀書，三年畢業，這其間最愛的是新文化一套書籍，並且逐漸對文學發生更大的興趣。畢業後曾與同學組織「斗千社」，想從事文學的譯作，却沒有成功，然而也就在這個時候，他已經在幹着人民解放的工作。

一九二七年在國民黨清黨的高潮之中，他由四川跑到江西的蘇區，幹地方羣衆工作。這並不是普通的訓練羣衆，而是組織羣衆對國民黨的圍剿作不斷的鬥爭。這工作使他得到了武裝鬥爭的經驗。

在共軍西征的時候，他和項英被留下了作打遊擊的工作，區域包括閩浙、贛、皖、湘、鄂等華中八省。這個時期是極其艱苦的。他們的隊伍常常受到敵人的圍攻，然而他能神出鬼沒，雖在被圍之中，敵人在附近嚴密搜索，仍舊搜不到他。

在抗戰初期，新四軍屢次受到國民黨軍隊的攻擊。一九四〇年六月，李明揚和李長江動員了十個旅以上的大軍，向江都新四軍的根據地進攻。那時江西南的陳毅，便立即渡江，以一共祇有兩團的兵力，打垮了李長江的全軍。

同年九月，李守維和李明揚又奉到蔣介石的命令，要趁新四軍立腳點尚未鞏固的時候，加以消滅。這時候陳毅的部隊前是長江，後是日軍，處境實在極其危險。他運用智慧和經驗，苦思焦慮，決定了誘敵的戰略。他在國民黨軍隊前面一直後退，退到黃橋附近，乘敵軍苦追到來陣線未穩的時候，便突然集中兵方，回到前線，分成數支，直向對方作刺入的猛攻，獲得了一個極大的勝利。李守維就在敗退的時候活活淹死在長江之中。

國民黨軍隊的戰略戰術那一套，陳毅是非常熟悉的，因而他能利用他們的弱點，不斷地獲得勝利。其中打敗王鐵漢，生俘馬勵武，李仙洲，郝鵬舉，又把張靈甫全師活葬在孟良崗山中，都是熒爇軍中的大功勳。

爲什麼陳毅被稱爲儒將呢？因爲他讀書極多，寫得一手好詩，下得一手好圍棋，在總部中有一個記者看他日間常常在吟詩下棋，而不知不覺他却在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真是不可多得的將才。

多少年來，每遇到一件值得記憶的大事，他總要寫幾句詩來紀念。新四軍的軍歌就是他創作的。他的詩總強烈地表現出他革命的鬥爭的精神。一九四二年在鹽城曾經作過一首詩，其中有兩句說：「死後猶當集舊部，雄兵十萬斬閻羅。」

這不是一個普通作詩的文士所寫得出來的話。

在這次解放戰中，橫渡長江，粉粹天塹，乃是一連串驚心動魄的大事之一，他們成功的祕訣，可以從陳毅的一番話中看出來：

「解放軍在毛主席領導下，養成一種風氣，遇事跟老百姓學習，跟他們商量，實事求是的演習。一個地方學會了，就傳佈出來大家學，同時我們又有軍中討論，反覆研究，提出許多問題來，補充老百姓的法子，使法子盡善盡美。」

第三野戰軍所管的渡江前線是在安慶與蕪湖之間的江面。國民黨的反動軍隊在這裏的東西梁山駐了重兵，安了砲位。江面上有一百五十隻美國給的艦艇遊弋上下，見到了人影船隻就開砲。同時，所有江面上可能有的船隻都被他們集中到南岸去，不許出來，幾百里江面森然無人，祇有茫茫白水。

然而陳毅並不氣餒，他開始在巢湖把陸軍訓練爲水軍，日日夜夜地用船做着各種的活動。此後

再學習渡過湖面。這樣在一個月內，就訓練了二三千個水手。跟着他們再將幾萬艘船，由湖港翻入長江。他們挖運河，築壩，有時索性將船背了起來，從陸地翻過了壩，送到長江裏去。他們在江堤下面打洞，使船能從洞裏入江，而江堤上則過砲兵。凡是這種工作，無論軍長或指戰員都一樣動手。他們到了長江，還派偵查員過江去，在敵人的大砲下練習爬懸岩，走峭壁。

當一切都已布置妥當，有了把握以後，他們便在四月二十一日早晨零時開始渡江，在二十四個鐘點以內，第三野戰軍幾十萬人已經全部跨過長江，那時候國民黨守軍還迷信着長江天險和美國的兵艦大砲，等到解放軍排山倒海而來，他們還以為是神兵由天而降呢。



## 賽劉伯溫——劉伯承

劉伯承跟人民解放軍其他的多數將領一樣，出身是很窮苦的。他的最好的磨練，是他從小就受到封建社會的侮辱與損害。這種侮辱與損害，對於富有反抗性的劉伯承，不但不能使他屈服，反而使他增長了對於舊的不合理的社會的憎恨，使他能夠堅定不移，終身獻身於革命的事業。

他是四川人，生長在一個小縣，父親是一個吹鼓手。他父親平日省吃儉用，積蓄了一點錢，請先生教他熟讀了四書五經去考秀才，誰知在那封建社會裏面，像吹鼓手這樣的職業，是被認為「下流」的，這樣的人的子弟，沒有考秀才的「資格」，他被攔在門外，不准參加考試。

在辛亥革命的前夜，不能學文的劉伯承，祇能改行去學武了。這對於中華民族真是一件幸事，因為不如此我們就不會有今日的這末一位從事人民解放的天才戰略家了。

他跑到川軍裏去入伍，憑了他的才幹，不久便升為一個軍官。然而這時候他已經逐漸養成了堅強的階級觀念，對於辛亥革命那樣不澈底的作法，深感不滿，因而在一九二六年，他就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去為真正解放人民的革命而工作。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發生了有名的暴動，主持其事的是暴動軍事委員會，劉伯承便是這委員會的參謀長。此後他往蘇聯求學，更增加了他的見識和才能。回國以後，便擔任設在上海的中央革命軍事會議的總參謀團的參謀。一九三一年，在江西中央蘇區訓練新兵，兼任總參謀長。這一段時

期很長，一直到抗日戰爭發生，這批新兵改編爲八路軍，他才改任一二九師的師長。

說到這裏，我們不能不回去提到一段傳奇式的故事，這也是中華革命史中最輝煌的一頁——就是共軍作二萬五千里長征時橫渡大渡河裏的一個插曲。

那時共軍爲了不願蹈太平天國中石達開的覆轍，他們要用快速的急行，去渡過那條險要的河流。可是他們從金沙江北上而入四川的時候，到了一個好戰而尚未開化的獯獯族的區域。這些獯獯在這裏數百年來佔據着四川的一個多森林又多山嶺的地帶。他們從來沒有被征服過，也從來沒有被周圍的漢人所同化。這個地帶的邊境，正在西藏的東方，被揚子江河流的大弧形所包圍。

這時候蔣介石很放心，他估計共軍在這裏不能不有一個長期的停留了，而他則可以很從容地在大渡河的北岸，集中兵力。他想獯獯族仇視漢人是傳統的，共軍走進他們的邊境，一定會遭遇到重大的損失，或者就此被消滅也說不定。

不料共軍軍中真是濟濟多士，其中一個便是劉伯承。他對於獯獯族的民情很熟悉，他還會說一些獯獯話。於是他就負了和他們交涉及友誼聯盟的使命，到他們的區域裏去和他們的首領們會議。他的遊說是這樣的：

你們反對壓迫你們的軍閥如劉湘和劉文輝等，共軍也是如此。你們要保持獨立，我們的政策正是贊助中國一切少數民族的自主。你們仇恨漢人，因爲漢人壓迫你們。可是漢人之中有壓迫的與反壓迫的兩個階級，共軍是屬於反壓迫的。這樣你們不是應該和我們聯合起來去共同反抗那壓迫我們的階級嗎？

這一番話使他們很感興趣；然而他們却要求槍械和子彈，以保衛他們的獨立，出於他們意料的，還要求共軍也慨然地答應了。

於是這個交涉便圓滿地完成了。共軍不但獲得安全的借道，而且還添了一支生力軍。這個小民族有好幾百人參加他們的隊伍，一同向大渡河進發去攻打共同的敵人劉伯承與那些首領們，還殺了一隻鷄，舉行了古老的歃血之盟，宣誓結爲兄弟。

這樣他們就由新的弟兄領導着，穿過狹窄的山道和森林地域，到達了大渡河。這是劉伯承在共軍中最大功勳之一。

劉伯承在軍中被部隊稱爲「賽劉伯溫」，因爲他常常有「神機妙算」，能夠在極度困難之中，克服頑敵。他真像劉伯溫一樣，也有他的五行。他常常說：「五行不定，輸得乾乾淨淨。」然而這五行却不是金木水火土，這五行乃是——

「任務，敵情，我情，地點和時間。」

他在每一次戰鬥以前，一定先把這個問題搞得清清楚楚，經過一番深思熟慮，然後定下決策，對於每一個命令的文字，還仔細斟酌，務必說到明確而周詳。他這一種細心，再加上大胆和英明的果斷，自然使他戰無不勝，攻無不克，被中共中央稱譽爲天才的戰略家，被日本人比作水滸傳中神機軍師的朱武。

在江西時代，在抗日戰爭的時代，在大反攻以前，共軍在兵量方面和配備方面，都遠不如敵人，然而共軍却能從敵人的手中奪過武器來配備自己，並且用突擊的方法來擊敗敵人。對於這個戰術，劉

伯承實在是一個能手。一九四〇年百團大戰後，在攻擊遼縣的一役中，他突然將部隊撤回，去突擊敵人救援遼縣的部隊。他在幾條公路裏面，選中一條，布置埋伏，命令部隊須在午夜十二時以前到達，一切都照計劃進行，果然打了一次勝仗。還有一次是在一九四二年敵人『掃蕩』太行山的時候，政治部比他的命令遲出發了二十九分鐘，結果便遭遇一星期的包圍。這位將軍計算的準確，可以在這裏完全看出來了。

他最反對等級思想，就是那種自以為高人一等的特殊階級的思想。因此他的一個名叫『太行』的兒子，當部隊裏面想辦子弟學校的時候，他斷然認為不妥，因為這樣易使孩子受到部隊中等級的反映的影響。這是有害的。他還舉斯大林為例。斯大林的兒子上學時，不讓別人知道他是斯大林的兒子，以免孩子有非分的特殊思想。

劉伯承被稱為標準的中國布爾塞維克。他自己說過：如果他一旦死了，他的墓碑上能刻上『中國布爾塞維克劉伯承之墓』，他就認為是他最大的光榮。

在人民心目中的『獨眼龍』劉伯承，是早有了這個光榮的。因為從辛亥革命到現在，除了一九二八以後的四年在蘇聯學習之外，他一直為人民解放而戰鬥着的。

## 龍馬精神的賀龍

那一天早晨六點鐘，我同四十多個青年交通隊一起出發，他們是護送貨物運輸隊到保安去的。這一隊人中，我發現只有我自己，外交部——紅黨的外交部——的專使，傅錦魁與紅軍司令李長林三人騎着牲口。這並不是說傅錦魁等有騎馬的特權，他騎的是一隻騾子，身上馱的東西已經是够重了，李長林騎的驢子也同樣地載重過分，只有我總算騎着一匹孤獨的馬，但是這匹馬是否還在我的胯下，我有時候竟也不敢十分自信。

我的馬有像彎月一樣的背，像駱駝一樣步伐。牠的瘦弱得可憐的腿蹣跚地走着，我深怕牠隨時會摔倒，嚙最後的一口氣。當我們順着峭壁所鑿成的狹路向前進的時候，牠就更加困頓。照我看起來，只要我的身體突然一側，我們就會一同跌到的山谷裏去。

李長林坐在行李上，嘲笑着我的侷促不安，說：「同志，你坐的是一副好鞍子，可是在牠的下面是什麼東西呢？」

在我的立場，是不應該抱怨的，因為無論如何我是什麼人，也應該騎馬嗎？可是，對於他的嘲笑，我禁不住要批評說：「只要回答我下面問題，李長林，你們騎在這種狗一般的馬上，怎麼能够打仗呢？你們紅色騎兵的馬就是這樣的嗎？」

「不是！不是！你應該知道！你的馬不是壞了嗎？因為我們在後方用這樣的壞馬，所以在前線我們纔有所向無敵的騎兵！如果有一匹強壯健走的馬，就是連毛澤東也不能把牠留在後方的。我們在後

方用的，只有這種狗一般的壞馬。各種應用東西都是這樣，槍、食物、衣服、馬匹、騾子、駱駝、羊，都把最好的東西供給我們的紅色戰士同志，假如你要一匹好馬，你得到前線去！」

我決定從速接受他的意見。

「但是，李長林，你自己怎麼不上前綫呢？你難道也壞了嗎？」

我壞了嗎？不，決不會壞的！不過前綫少用一個好人容易，少用一匹好馬却是很難的！」

的確看起來，李司令真是一個好人，一個好的布爾什維克和好的講故事的人。他已經做了十年的共產黨員，是一九二七年——那是中國共產黨成爲獨立隊伍的第一年——的南昌暴動的主角之一。在這崎嶇不平的山西境內的山路上，我有時候騎馬，有時候步行，有時候氣喘，有時候口渴，跟着李司令，他把往事一件一件的追訴着，甚至於屈着身體講給我聽。

他還是一個年青的人，大約三十一二歲，可是當他逐漸地把他的往事揭開時，你就曉得他出生入死已有十多次了。從他身上，我開始發現一種特殊的性格，這種性格後來我在中國的革命戰士中是常看到的。某種東西使個人苦痛與勝利的，成爲集體的負擔或大家的快樂，某種力量使各個人一律平等，使各個人都忘記了自我，大家在自由中，嚴肅中和艱難中共同努力。

倘若你認識中國的說法，這樣的事情恐怕你要以爲是不可能的，可是這個的確是事實，等我以後再來解釋。

李長林是湖南人，當中國國民革命開始的時候，他還是中學生。他加入了國民黨，一直到一九二九年清黨以後，他纔加入共產黨。有一個短期間，在鄧發領導之下，他曾經在香港組織工人。後來，他到

江西的蘇維埃區，成爲遊擊隊的領袖。一九二五年，國民黨曾經命令他和一個宣傳隊去幹一件責任非常重大的工作，他們的任務是去會見匪首賀龍，說服他去參加國民革命。現在國民黨報紙上稱爲罪惡昭彰的賀龍，在當初，他的反正是國民黨極重視的。

一天，我們在溪邊的樹蔭下休息的時候，李君告訴我：「即使在那個時候，賀龍的部下也並不是土匪，他的父親是哥老會的一個首領。賀龍承襲了父親的威勢，在年青的時候，聲名就遍佈湖南全省。有許多關於他在年青時的勇敢故事，這個湖南人（李司令）全告訴了我。」

「他的父親是前清的一個武官，有一天同僚宴客，他把賀龍帶去，在人家面前誇獎賀龍的膽大。有一個客人決定要試驗一下，便在桌子下面放了一槍。據說，賀龍連眼睛都沒有雲一霎。」

「當我們會見他的時候，他已經被收編爲省軍。他所管轄的區域，正是雲、土運往漢口的要道，他就徵收煙稅爲生，並不剝削老百姓。他的部下也不和舊軍閥的軍隊一樣的狂嫖濫賭。他不准兵士吸鴉片，他們都把他們的來福槍擦得很清潔。賀龍自己也不抽煙，但是拿鴉片來敬客都是他那裏的一種習慣。所以當我們到達時，煙鎗和鴉片都擺在炕上，我們便在炕上談革命。」

「我們宣傳隊的領袖是周逸羣，他是共產黨，和賀龍有着親戚的關係。我們同他談了三個星期。賀龍除了軍事以外，沒有受過多少教育，可是他並不是一個無知無識的人，他很快地了解了革命的意義。但是他也經過了一番詳細的考慮，並且再和部下商議了，然後纔決定加入國民黨。」

「我們在他的軍隊中設立一個黨務訓練學校，主任是趙易生，他後來是被殺的。這雖然是一個國民黨的訓練學校，大多數的宣傳員都是共產黨員，許多學生後來都成爲政治上的領袖。除了賀龍

的軍隊以外，該校並培養第三師的政治工作人員，那時第三師師長是袁祖銘。袁祖銘是一個左傾軍隊的司令，被唐生智的部下暗殺，以後第三師就歸賀龍指揮，賀龍的軍隊擴充成爲第二路軍，成爲國民黨左傾將軍張發奎所統率的第四集團軍的一部分。

李長林說賀龍是直到一九二七年南昌的八一暴動以後，纔加入共產黨的。在這個時期以前，他還效忠於汪精衛的武漢政府。當唐生智、何健等鎮壓打倒地主的運動開始，「農民大屠殺」國民黨的軍閥不僅屠殺共產黨，並且屠殺無數的農會領袖，工人及學生的時候，賀龍纔毅然決然的投入共產黨。他本身是一個農家子，他完全同情窮人，大屠殺激起他的憤怒。

何健，他現在是湖南的南京政府的官吏，是「反革命軍閥中最野蠻最殘酷的一個」，據李君說，「我不知道他總共殺了多少人，——無疑地已經殺了好幾萬人。我知道在我的家鄉瀏陽縣，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到六月中間，他殘殺了二萬餘農民，學生和工人。我也在那裏，所以我知道得很清楚，據說在他的本鄉醴陵縣，他也殘殺了一萬五千人。」

我奇怪李君本人怎樣能够脫逃，我問他。他拉開藍布短衫，指着一條長長的疤痕，笑着說：「你瞧，我沒有完全逃脫啊！」

「南昌事件以後的賀龍怎樣呢？」

「他的軍隊打败了。他和朱德向汕頭移動。他們又打败仗。他的殘餘部隊竄入內地，賀龍本人則逃到香港。後來他秘密轉到上海，化裝了重返湖南。」

「據說，賀龍是用了一把小刀把湖南的蘇維埃區建立起來的。這是一九二八年的事情。賀龍匿



居在一個鄉村，和哥老會中人密謀起事，恰好在國民黨統治下的縣政府的收糧員到來。他就率領着幾個農民，攻擊那些收糧員，親用自己的小刀把他們殺死，並把他們的衛隊繳械。這樣，他獲得了手槍和步槍，第一次的把他的農軍武裝起來。」

賀龍在哥老會中的名望，是全國都知道的。紅黨中人說，他可以赤手空拳的走到任何一個鄉村去，通知哥老會組織起一支軍隊來。這種會裏的特殊禮節和術語，是很難通曉的。而賀龍對於這二方面，却最擅長。他的能言舌辯，在國民黨中極為有名。李司令說：「他講話時能夠把死的說出活的來。」據說當賀龍的第二方面紅軍於一九三五年從湖南的蘇維埃區撤退的時候，共有四萬多枝步槍，他的軍隊在「長征」中所碰到的困苦艱難，遠過於江西的主力隊伍。許多人在雪山上凍死，許多人餓死，許多人給南京政府的飛機炸死。可是在中國的農村裏，賀龍的吸力和聲勢是極大的，他的部下都情願死在路上，而不願中途離開，他並且在「長征」途中，一路上有許多勞苦大眾參加進來，補充他的隊伍。他到達西藏的東部，與朱德會合。那時候他的隊伍，已經只剩二萬人左右，大多數赤着腳，光着腿，餓着肚子，弄得筋疲力盡了。在這裏休養了幾個月，他的軍隊又開始向甘肅出發，預定在幾個星期內到達那裏。

「賀龍到底是怎樣一個人？」我問李司令說。

「他的身材魁梧的人，像老虎一樣的強悍。他雖然已是五十歲出頭的人，他還是極其健壯。他從來不覺得疲倦。他們說在「長征」途中，他還攜帶了許多傷兵。即使在他做國民黨的將軍的時候，他的生活就和兵士一樣簡單的。除了馬以外，他對於個人的所有物絕對不放在心上，他頂喜歡馬。有一

次，他覺得了一匹很美麗的馬，他真愛護着牠。有一天那匹馬給敵人搶去了，他便追擊敵人，終於把那匹馬奪回來！

「雖然他的性子很粗暴，他也是很虛心的。自從加入了共產黨以後，他對於黨絕對忠實，從未破壞過黨的紀律。他常常請求人家批評，聽從人家忠告。他的姊妹很像他——是一個身高脚大的女人。她自己曾經親自率領了紅軍作戰，把受傷的兵士馱在她的背上。賀龍的妻子有和她一樣的本領。」

就在他的紅軍第一次組成功的時候，就在湖南的共產黨尚未完全受中國共產黨控制的時候，賀龍憎惡富人這一件事情，在中國已經成爲一件稗史。許多農民因爲他們在「農民大屠殺」失去許多的親戚和朋友，許多農民因爲在何健的反動統治之下受着了無數的苦痛和壓迫，都存着復仇的心理去投奔賀龍。據說，地主和紳士們就是在南京軍隊嚴密保護的地方，只要一聽到賀龍到來，離開那裏還有二百里路的消息，也往往就逃避一空，因爲賀龍的敏捷的行動，是大家都知道的。

不久以後，賀龍拘獲了一個名叫布司哈（Bosshard）的瑞士教士，因爲他是一個間諜，軍事法庭就判了十八個月的徒刑。所謂間諜大約是指將紅軍移動的消息報告國民黨的官吏而言。許多外國教士都有這種習慣，當賀龍的軍隊開始「長征」的時候，布司哈的刑期還沒有滿，所以叫他隨着軍隊出發。刑期滿後，賀龍就開釋了他，並且給他旅費到雲南去。奇怪得很，布司哈對於賀龍並沒有什麼怨言。正好相反，據說他曾經這樣說過：「如果農民知道共產黨到底是怎樣人，就再也不會逃走了。」

（註）

（註）這是陸克博士（Dr. Joseph F. Bock）告訴我的，他是布司哈回到雲南之後和他說起的。

315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六月出版

中共六將星

定價

編著者

出版者

全國各大

002

KBC

G

825.2

22